

隱藏在關鍵詞中的歷史世界

金 觀 潤^{*} 劉 青 峰^{**}

摘要

二十世紀30年代，柯林武德（R.G. Collingwood，1889-1943）提出「歷史是活著的過去（the living past）」，並認為歷史知識濃縮（encapsulated）於現今思想結構中。我們在對中國現代政治觀念的研究中發現，以關鍵詞為中心、揭示觀念與社會行動之間的相互作用、特別是社會行動如何反作用於觀念，可以印證柯林武德的上述命題並解決其中的困難。本文還進一步討論，當關鍵詞研究範圍從對應著概念的關鍵詞，擴大到包括事件、各式各樣社會行動、行動主體和對象以及各類事物的關鍵詞時，對關鍵詞的統計分析就會從涉及概念史、思想史擴大到以歷史為中心的整個人文科學；而隨著數據庫方法在各類關鍵詞研究的應用，也將推動數位人文學的興起。東亞觀念史研究正是從事這一探索的最佳領域。

關鍵詞：東亞觀念史、概念史、數據庫方法、數位人文學

* 作者現任政治大學講座教授。

** 作者現任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名譽研究員。

On the Historical World as Concealed in Keywords

Jin Guan-tao Liu Qin-feng

Abstract

In the 1930s R.G. Collingwood suggested that “History is the living past” and knowledge of it is encapsulated in the very structure of present thought. During our research of Chinese modern political concepts we discovered that using keywords as the basis for revealing interaction between concept and social action, especially how social action counteracts on concept, enabled us to verify the above suggestions by Collingwood, as well as resolving its inherent conflicts. This essay further discusses how, when the study of keywords is expanded from its relation to concepts to an inclusion of events, namely different social actions related to subjects or objects, the analysis of keywords will be broadened from the realm of conceptual and intellectual history to include the whole humanistic discipline, with history as its core. The adoption of a method based on database analysis into the study of different keywords will lead to the rise of a type of digital humanist studies, with the study of East Asian conceptual history at its forefront.

Keywords: history of East Asian concepts, history of concepts, database method, digital humanities

隱藏在關鍵詞中的歷史世界

金 觀 濤 劉 青 峰

自然的過程可以確切地被描述為單純事件的序列，而歷史的過程則不能。歷史的過程不是單純事件的過程而是行動的過程，它有一個由思想的過程所構成的內在方面；而歷史學家所要尋求的正是這些思想過程。一切歷史都是思想史。

——柯林武德

歷史研究中一直存在著兩種基本追求，一是尋找歷史展開的長程模式，二是力圖使歷史研究科學化。二十世紀，這兩種努力都經歷了巨大的挫敗。從十九世紀末歷史唯物論興起力圖取代觀念論，到二十世紀馬克思主義經濟決定論衰落，人們對尋找長程歷史發展模式失去了信心，史學研究在社會科學進逼和後現代史學消解的雙重壓力下不斷退縮，史學研究的基石也受到侵蝕。

但從另一方面來看，從二十世紀30年代起至今日，恰恰是在歷史學科中人文成份最強的觀念史、概念史及關鍵詞分析中，研究者對歷史科學化的特質理解日益深入。特別是隨著數據庫方法開始應用到觀念史、概念史，我們發現，關鍵詞意義演變的統計分析可以探究大歷史的宏觀結構，而東亞觀念史研究或許會在這個方興未艾的領域呈現出日益重要的意義。為了探討這一史學研究的新趨勢，我們必須從1930年代英國歷史學家柯林武德（R.G. Collingwood，1889-1943）對史料本質的新發現講起。

一、觀念史意義的發現：柯林武德「三原理」

歷史學家通常把歷史視為過去發生的事實，認為可靠的史料紀錄了當時的事實，而歷史研究的目的就是尋找可靠的史料並據此恢復過去發生的事件以作出合理的解釋。柯林武德正是從質疑何為真實的史料來建立自己的歷史方法論的。他指出，歷史事實和科學研究的自然過程之事實存在本質不同。研究者認識自然過程中的事實，只要詳盡地觀察它，客觀地紀錄它，並根據真實的紀錄就能將過去發生的事實還原並作出科學解釋。但是，歷史過程的核心並不是（自然過程中的）事實，而是人的社會行動；任何社會行動一定存在著支配行動展開的動機和觀念；如果不了解人的動機以及支配觀念，僅僅從旁觀察和紀錄這個行動，是不可能理解它為什麼發生，甚至無法判斷該行動的真假。

我們以影響中、日、韓三國歷史走向的重大事件甲午戰爭為例，說明任何社會行動都存在兩個層面：一個是類似於自然事實的物質和行動層面，第二個是動機和觀念層面。在中日戰爭中，兩國各投入多少軍隊、戰艦及其裝備、作戰地點、環境以及交火起始過程等，都屬於第一層面，找到該層面的準確史料，就可以還原大戰面貌。但是，僅僅知曉第一個層面的事實是無法理解甲午戰爭的，例如為什麼戰火是在朝鮮點燃？交戰各方如何制定戰略戰術目標？從戰爭爆發原因、戰爭責任到戰爭對參戰各國的衝擊，無一不與支配參與者觀念，即第二個層面不可分割。

甲午戰爭時期，中國人對這兩個層面一清二楚，1895年在檢討戰爭為何發生以及戰敗原因時都曾追溯這兩個層面的問題。如在追究戰爭責任時，張佩綸就認為，由於袁世凱在長期領兵駐守韓國的期間背離了處理宗藩關係的基本準則，過分干預朝鮮內政，視韓國君

臣「如奴」、「如蟻」，¹引起中韓關係交惡，因此袁世凱必須對誘發戰爭負極大責任。還有人認為，決定出兵並掌控戰事的李鴻章是罪魁禍首。隨著時間流逝，第二個層面的記憶開始模糊甚至被遺忘。以至於到1995年甲午戰爭百周年時，歷史學家對戰爭爆發原因仍爭論不休。²這一重大歷史事件是如何發生的成為一個歷史之謎。

今日對甲午戰爭研究的困難，不是因為第一個層面知識的缺乏，而是對第二個層面的無知。事實上，無論是甲午前十二年袁世凱領兵赴朝鮮平亂及長期駐守，還是1894年李鴻章指揮參戰，都是受韓廷主動之請；支配袁、李行為的觀念是由天下觀轉變而來的萬國觀，清廷參戰的目的是捍衛東亞殘存的宗藩關係。日本出兵韓國，表面上是根據1885年《中日天津條約》，實質上是受明治維新後擴張性的日本民族主義支配。而韓廷之所以主動邀請清、日兩國出兵漢城，則是出於對兩國既要利用又要防範的矛盾心理，是韓國對天下觀工具性利用的產物。³

研究者只有把這兩個層面知識結合起來才能恢復歷史真實，但歷史學家掌握的史料大多是第一層面的知識，而思想史研究者的知識也只是認識第二個層面的前提，兩者加起來，充其量只是推測歷史事件如何發生的線索。據此，柯林武德認為，史料作為觀念支配下社會行動的紀錄，只是歷史學家用以推測社會行動為何發生、怎樣發生的「證詞」。⁴他指出，正如偵破謀殺案中不同人提供了對同一事件的不

¹ 張佩綸：《潤于集書牘》卷6，頁10。轉引自林明德：《袁世凱與朝鮮》，收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專刊（26）》（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年再版），頁394。

² 戚其章：〈中日甲午戰爭史研究的世紀回顧〉，《歷史研究》2000年第1期，頁148-165。

³ 劉青峰、金觀濤：〈19世紀中日韓的天下觀及甲午戰爭的爆發〉，《思想》第3期（2006年10月），頁107-128。

⁴ 他這樣論述：「如果歷史學意味著科學歷史學，我們就必須把『資料』讀作『證據』。」柯林武德著，何兆武、張文杰譯：《歷史的觀念》（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年），頁385。

同證詞那樣，如果不了解行動者的動機，不設身處地去想像行動者是在何種觀念支配下行動，歷史學家即使是該行動的目擊者，也不一定知道真的發生了甚麼。

柯林武德指出：「過去決不是一件歷史學家通過知覺就可以從經驗上加以領會的既定事實。」⁵更何況大多數史料並不是目擊者的紀錄，而是轉述及評論。因此，在面對史料時，歷史學家的態度應該是「並不幻想著自己就是一個目擊者。他十分清楚地知道，他對過去唯一可能的知識乃是轉手的或間接的，絕不是經驗的。第二點就是，這種轉手性不能由驗證來實現。歷史學家知道過去，並不是由於單純地相信有一個目擊者看到了所討論的那些事件，並把他的見證留在記錄上。」⁶換言之，再可靠的一手史料，紀錄的都不一定是歷史事實本身，研究者應該把它們當作可以推測社會行動如何發生的證詞。

那麼，研究者又如何把證詞轉化為對當時社會行動怎樣發生的判斷呢？柯林武德認為，這就要求歷史學家通過對證據的理解，在自己腦海裡重演這一社會行動，他把這一原則提高為判別歷史事實真假的普遍法則。也就是說，如果某一歷史過程不能在歷史學家心裡重演，研究者就根本不能了解其真相，甚至不能判斷它是否真的發生過。⁷柯林武德這樣論證道：「歷史學家在自己的心靈裏重演他所敘述的那些行動者的所作所為的思想與動機；而任何事件的繼續卻不是歷史的繼續，除非它所包括的行動動機，至少原則上如此，是能夠這樣加以

⁵ 柯林武德著，何兆武、張文杰譯：《歷史的觀念》，頁388。

⁶ 柯林武德著，何兆武、張文杰譯：《歷史的觀念》，頁389。

⁷ 為什麼某一過去的行動在研究者腦海裡重演代表真實呢？柯林武德沒有給出明確回答。我們在〈歷史的真實性〉一文中作出了如下論證：如同科學是用受控實驗的可重複性作為判斷現象為真的原則，歷史在觀念支配下的展開，必須用擬受控實驗原則判別真偽；「可重演性」是擬受控實驗的特殊情況。詳細討論參見金觀濤、劉青峰：〈歷史的真實性：試論數據庫新方法在歷史研究中的運用〉，《觀念史研究：中國現代重要政治術語的形成》（香港：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2008年），頁428-431。

重演的。」⁸

由此，柯林武德論提出了他的歷史是「活著的過去」(the living past) 的著名論斷。

對於歷史上曾發生的事件，過去的自然事實（如甲午之戰沉海的戰艦）存在於時空長河的某一點（它對應著歷史第一個層面），而支配當時人們行動的觀念則存在於現在可恢復的當時思想觀念中（即第二個層面），研究者只有通過證據進入這一思想、觀念之海洋，結合第一個層面才能找到過去行動的真實圖像。需要指出的是，柯林武德對思想觀念史理解歷史真實意義的強調，並不是服膺觀念論那種觀念決定一切的主張，而是認為真實的歷史存在於觀念世界中。

柯林武德的發現可以概括為三條基本原理。除了歷史是活著的過去這第一條原理外，第二條原理是任何歷史研究都涉及二階 (second order) 歷史，即關於該問題的思想史。第三條原理則更為廣泛，他認為：歷史知識是濃縮 (encapsulated) 於現今思想結構中的過去思想的重演，現今思想與過去思想對照並把它限定在另一種層次上。⁹因此，柯林武德大膽宣稱：一切的歷史都是思想史。

柯林武德充分意識到自己發現的意義，對歷史科學具有雄偉的信心。他認為，歷史科學對二十世紀的重要性猶如 1600 年至 1900 年間自然科學對世界的重要性。但是，柯林武德「三原理」在史學實踐中並沒有起到他期待那樣的重要性。這不僅是因為「三原理」的表達相當含混，不容易理解；而且還因為理解他的命題還涉及不得不面對的一些更為基本、不可繞過的困難。

⁸ 柯林武德著，何兆武、張文杰譯：《歷史的觀念》，頁 174。

⁹ 何兆武、張文杰：〈譯序：評柯林武德的史學理論〉，收於柯林武德著，何兆武、張文杰譯：《歷史的觀念》，頁 21-22。

二、困難之一：觀念之謎

把歷史真實視為隱藏在今日和過去相聯的思想結構中，首先要回答，甚麼是今日和過去關聯的思想結構？在歷史研究中，把人類今日思想和過去思想加以關聯的研究是思想史。思想史研究主要是以個別思想家、流派為中心，以著述文本為主要分析對象，研究者據此勾劃出思想發展的歷史脈絡。歷史上思想家的影響再大、再重要，也只不過是歷史事件長河中的浪花。柯林武德所說的蘊含歷史真實的思想結構，並不是那種簡單的指以思想家個人思考和著作為中心的思想史，而是指歷史上人們共有的思想，即全社會賴以溝通的普遍觀念及其演變脈絡。實際上，這正是二十世紀興起的觀念史研究所關注的問題。

然而，觀念史又是甚麼呢？要回答這一問題，首先必須回答「何謂觀念」？「觀念」一詞最早源於希臘「觀看」和「理解」，即“idea”這個字來自於古希臘「看見」一詞，其意思是心靈可以把握的事物。自柏拉圖起，共相被視為理性把握對象的前提，所以觀念在古希臘還有一層涵意，就是「共相」。西方從十五世紀就用該詞表達事物和價值的理想類型（ideal type），也指人對事物形態外觀之認識；十七世紀後涉及構思過程。¹⁰

觀念強調人所共有的思想，特別是那些具有可溝通性和公共性的思想；觀念與思想家個人的沉思默想不同，它與支配人行動的動機及價值直接相關。正如弗耶利（Alfred Fouille，1838-1912）所說，觀念是「我們的感覺和衝動所呈現出的知覺形式；每個觀念不僅涵蓋一種智力行為，而且涵蓋知覺和意志的某種特定的方向。因此，對於社會亦對於個體一樣，每個觀念均為一種力量，這種力量愈加趨向實現其自身的目的」。¹¹ 也就是說，觀念作為包含動機的思想，是改造世界

¹⁰ 雷蒙·威廉士（Raymond Williams，1921-1988）著，劉建基譯：《關鍵詞：文化與社會的詞彙》（臺北：巨流圖書公司，2003年），頁167。

¹¹ 轉引自約翰·伯瑞（John Bagnell Bury，1861-1927）著，范祥濤譯：《進

的力量。觀念又不同於支配人們行動的情緒及情感，它是以認知的方式呈現出來的一種知識類的價值型態。正因為如此，查爾斯·A·比德爾（Charles A. Beard，1874-1948）認為：「一個民族的文明程度，與其在自己的勞作和志向中融入觀念的程度成正比。」¹²

因此，我們把「觀念」定義為社會行動的思想元素，它構成了社會行動的目的、價值和自我意識。¹³從這一定義，就可以理解柯林武德所說的蘊含歷史真實的「思想結構」的準確含意及為什麼歷史是活著的過去。歷史作為人在心裡可以重演的過去的社會行動，確實是存在於當下人們的觀念世界中，這就是人類的歷史記憶。但是，生活在不同時代的人們只能根據他們的時代觀念去想像過去的社會行動，歷史記憶並不一定是過去真實發生過的社會行動；而歷史學家從事的研究正是根據史料去恢復過去社會行動的思想要素，通過思想的重演去尋找那個存在於流變著的觀念世界中的歷史真實。因此，柯林武德研究綱領的貫徹或歷史研究的科學化第一個前提是觀念史的興起。

表面上看，觀念史在二十世紀是作為歷史研究專門化出現的，其代表事件是諾夫喬伊（Arthur O. Lovejoy，1873-1962）創辦《觀念史期刊》（*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事實上，從1930年代開始興起的觀念史研究是受到兩股動力的推動，一是對抗歷史研究中越演越烈的社會科學化潮流，即很多研究者把歷史事實等同於自然事實，只重視社會行動本身的研究；二是對歷史研究專業化帶來思想文化研究支離破碎趨勢的不滿。諾夫喬伊明確指出：「觀念研究的不自然分裂，至少分隔了十二個學門。文學、藝術、科學、神學、教育、社會思想的學者，每個人都強行帶走西方思想體系的一部分，彼此孤立地在他們的密室裡極其仔細地去分割它，而整個有機體便在這種過程裡

步的觀念》（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5年），引言，頁1。

¹² 轉引自約翰·伯瑞著，范祥濤譯：《進步的觀念》，引言，頁2。

¹³ 在社會行動中存在一個思想層面，這個層面是由計畫、目的、行為評價標準和人與人之間的溝通組成的，它總可以分解為一些基本元素，這些元素在該社會行動中是不變的，我們稱其為「觀念」。

死亡了，沒有人能恢復其生命，除非一個名為『觀念史』的學門才能使它起死為生。」¹⁴這兩種動力背後存在著統一的精神，這就是對過去社會行動思想層面的好奇，意識到社會行動的思想要素是統一地存在於過去時代人們普遍的心靈之中，絕不是可以通過細密的專業分工加以把握的。

一旦把普遍社會行動的思想層面從社會行動中抽出來作為歷史研究的對象，觀念史研究者就發現，儘管一個時代社會行動的思想層面相當複雜，但它們卻是由一些幾乎不變的元素構成，諾夫喬伊稱其為觀念的最小單位（unit-idea）。這些不變的最小單位可以獨立地加以研究，它們可以包括思想的習慣，有時甚至是人類對形而上學的熱情，它們是人類思想中很深層的一面。而觀念與觀念之間係互相關聯，彼此吸引可以形成某種結構；有時它們也圍繞著一個核心觀念打轉，就像行星圍繞太陽運行一樣形成觀念系統（如意識形態）。歷史上每個時代，通常都會有一兩個佔主導地位的觀念。諾夫喬伊曾以「存在的巨鏈」為核心梳理了相應觀念群在西方的流變。¹⁵觀念史研究發現，有些觀念系統的結構具有長程的不變性。

從諾夫喬伊至今，觀念史研究取得了許多矚目的成就，例如，各種多卷本觀念史大辭典陸續出版，對涉及西方社會、法律、宗教、科學、文學、藝術等各層面許多重大觀念的起源、演化作出細緻、清晰的梳理。但是，要令人信服地展開柯林武德的研究綱領，以觀念史作為過去社會行動研究的中心，還必須解決第二個問題，這就是如何面對經濟史的挑戰。

¹⁴ Arthur O. Lovejoy, "The Historiography of Ideas," in 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Ideas (Westport: Greenwood Press, 1948), 1-13.

¹⁵ 諾夫喬伊（Arthur O. Lovejoy）著，張傳有、高秉江譯：《存在巨鏈——對一個觀念的歷史的研究》（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

三、困難之二：如何宏觀地把握歷史演化的核心？

我們知道，經濟史是歷史研究中最接近社會科學的部分，今日的經濟史研究在分析十七世紀阿姆斯特丹國際貿易時，甚至連當時為何鬱金香價值連城及其與市民生活的關係都講得一清二楚。經濟史學家也早就論證過，羅馬帝國銀礦的枯竭是如何打擊了古代市場經濟。在經濟史研究中只須遵循史料客觀原則，並不需要把史料當證詞，去深入理解十七世紀荷蘭或羅馬帝國的觀念世界。看來在經濟史研究中，柯林武德的原則可有可無。

難道研究者在判別過去的經濟事件時不需要在腦海裡重演其過程嗎？當然需要。那麼，問題又出在甚麼地方？原來，在市場經濟的歷史研究中，支配大多數經濟行為的基本觀念，如理性的個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等，古今是一樣的。假如經濟史研究者處理的對象是如古典小說《鏡花緣》「君子國」中的君子們不追求利潤的社會行動，君子們的經濟行為是受相反的「貴買」、「賤賣」觀念支配，那麼，不依據柯林武德的原理去理解「君子國」獨特的觀念世界，就無法判定發生在「君子國」經濟事件的真假。正因為支配古今行動的觀念大致相同，研究者利用今日熟悉的觀念就能重演過去的經濟行動，所以在經濟學、政治學和社會學中，雖然每一種行動都受觀念支配，但由於支配行動的觀念是人人皆知的不變量，使得這些基本觀念反而倒是可以懸置不加考慮的。社會科學家不是不了解不同時代有不同主流觀念，但是他們相信，在研究中只要先懸置觀念，找到規定社會行動之間關係的法則（這是社會科學的因果律），然後把不同時代的獨特觀念及其制度作為對社會科學法則的初始條件和限定，那麼社會科學就可以對歷史作出合理的解釋。也就是說，社會科學法則是可以和觀念變化互相分離，科學地解釋歷史只是不斷將社會科學運用到歷史研究中。

顯而易見，只有找到上述預設完全無效的領域，並證明觀念變遷是構成歷史行動展開的中心環節，柯林武德將歷史真實視為蘊含在過

去觀念世界的「三原理」才能真正成立。存在著這樣的領域嗎？與此相對應的問題是，歷史學是否有自己的不同於社會科學（經濟學、政治學和社會學）的因果法則？在這一類歷史研究中，不可以懸置觀念，也不能想當然地估計過去觀念，而是把觀念作為支配某一社會行動的動因，考察原先支配該行動觀念又如何受到行動結果的反作用而發生改變，並引發下一步的社會行動。也就是說，在這樣的領域，研究者解讀事件對觀念衝擊就如同打開一扇扇門，只有進入其中才能知道歷史上觀念巨變是如何發生並影響到此後行動，這樣柯林武德的「三原理」才必是不可或缺的。

仍以甲午戰爭為例。如前面已述，戰爭的爆發是以下三種不同觀念互相衝突的結果，即中國干預朝貢國的萬國觀、日本獨特的民族主義以及朝鮮天下觀中對中日兩國工具性利用的心態。眾所周知，中、日、韓三國同屬儒教文明，宋明理學曾是這三國傳統社會共同的政治文化，那麼，促使三國捲入甲午戰爭的不同觀念又是從何而來？進一步分析這些觀念的形成，可以幫助我們理解事件（社會條件）對宋明理學的衝擊如何會導致它轉化為不同的觀念，從而影響歷史進程。宋明理學（特別是程朱理學）是儒學融合佛教的產物，其成熟後，在東亞產生了極大的影響，成為東亞三國共同的政治文化。但是由於中、日、韓三國不同的社會條件，宋明理學的反作用導致其向三個不同方向的變化，各自的天下觀發生不同變異，在十九世紀末全球化格局中，這些不同觀念成為支配三國不斷捲入不可調和的衝突、終至爆發激烈大戰的理據。

先簡單看看宋明理學在中國的演變。理學在明代是指導國策的官方意識形態，滿人入關滅明，對士人來說猶如天崩地裂。明末清初有相當多儒者激烈反思宋明理學，認為宋明理學的空疏應為「亡天下」負責，於是注重事功的經世致用和重考據的實學興起，形成了中國近代思想傳統。十九世紀中後期，在清朝受到西方列強的侵略並被納入國際法條約體系的局勢下，經世致用成為主導思想並對天下觀的改造

形成了比傳統天下觀更加積極有為的萬國觀。左宗棠平西部之亂、新疆建省，袁世凱駐守朝鮮十二年間對韓國內政橫加干預，都是受到這種積極參與並捍衛與周邊地區和國家既有關係事務的萬國觀支配，¹⁶這也是1894年李鴻章拍板與日本決戰的出發點。

日本接受了宋明理學後，受到其天皇和幕府二元社會的結構反作用，形成了日本式的儒學。丸山眞男指出，通過山鹿素行（1622-1685）、伊藤仁齋（1627-1705）到荻生徂徠（1666-1728），特別是經荻生徂徠的改造，日本儒學出現了政治和道德的分離，形成與中國儒學的不同形態。¹⁷這種理性與道德二元分裂的儒學形態為日本國學和蘭學留下興起和發展空間。到十九世紀中期，一旦受到西方衝擊，日本受這種現代思想框架中的政治倫理支配，順利引進西方現代政治經濟制度也獲得正當性基礎，日本迅速變成近代民族國家。現代化的成功令其發展出以日本為中心、帶領東亞崛起以對抗西方的獨特民族主義，關韓征臺觀念膨脹，日本先後侵占琉球、覬覦朝鮮。到十九世紀末，日本在視朝鮮半島為登陸亞洲大陸基地的觀念支配下，必然要與不放棄朝鮮的中國決一死戰。

在明代，信奉理學的朝鮮臣服明朝、視中國為天下中心，自稱「小華」。清朝的建立，令朝鮮再也不能把處於夷敵治下的中國視為天下中心，堅持理學信仰的朝鮮成為復原「中華道」的道德載體，朝鮮甚至不惜自我犧牲來保衛中華傳統。這樣，以中國為中心的天下觀就轉化為朝鮮獨特的「朝鮮中華主義」天下觀。¹⁸在這種獨特的天下觀指導下，朝鮮與清廷關係也發生微妙變化。雖然朝鮮再次接受冊封，但朝貢關係中的道德含意已大打折扣；在以維護儒家道德正統為己任

¹⁶ 金觀濤、劉青峰：〈從「天下」、「萬國」到「世界」——晚清民族主義形成的中間環節〉，《二十一世紀》總第94期（2006年4月），頁40-53。

¹⁷ 丸山眞男著，王中江譯：《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北京：三聯書店，2000年）。

¹⁸ 林熒澤：〈中國中心天下觀及其克服的課題〉，韓國成均館大學校主辦：「東亞學術院國際學術會議」（2006年5月18日）論文，未刊稿。

的朝鮮，儒學後來成為爭取本國民族自主的認同符號。十九世紀後期，朝鮮在這種獨特天下觀支配下，既要捍衛理學、維護和利用朝貢關係以抗拒對朝鮮有佔領之心的日本，又要防範清廷過度干預，使本國可以順利學習日本成功經驗，實行改革以求自存。正因為受到這種天下觀的支配，1894年為平東學黨之亂，韓國才既按宗藩關係邀請清廷出兵，又依《中日天津條約》允日本派兵，其結果是引火燒身，終於在本土引爆中日兩國的大戰。

在上述例子中，觀念變化之所以不能與社會行動變化相剝離，這是因為觀念變化緣於其引發社會行動的反作用。我們發現，該例子涉及過程很漫長，是因為它存在於三國社會結構的變遷中，特別是傳統社會向現代轉型之中。十九世紀下半葉，同屬儒教文明的中、日、韓三國幾乎同時受到不可抗拒的全球化衝擊，但是為什麼三國現代化道路會如此不同？對這個從經濟史、社會史很難得到較為整合看法的問題，卻可以從觀念與社會行動的互動來回答。從上述思想觀念的演變脈絡來看，由於三國儒學已具有不同的形態，因而面對西方現代衝擊，在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都會作出不同的反應。不同的反應再一次反作用於不同的觀念世界，導致近代思想發展的更大差異。不進入三國不同的觀念史世界，就很難理解三國不同的現代轉型方式。在這類研究中，只有將整個歷史過程納入觀念史世界，才可以宏觀地把握社會轉型的過程。由此可見，在社會結構演變特別是社會轉型研究領域，觀念史擁有無可比擬的重要性。這個重要性，最早是在德國「概念史」研究中顯示出來的。

四、概念史和關鍵詞研究

歷史上，德國在十九世紀中葉成為現代民族國家，社會現代轉型發生在1750至1850年這一百年間。社會現代轉型意味著現代價值的普及以及民族認同的形成，新觀念支配的社會行動就是建立民族國

家。德國現代思想的形成不僅僅是依賴於學習，也是法國大革命和拿破崙入侵對德國原有傳統觀念的衝擊造成。這是一個觀念支配社會行動以及社會行動改變觀念的互動過程。在西方觀念史研究中雖然積累了不少對兩千年間普遍觀念流變的成果，但尚未有對觀念的變化、特別是重大歷史事件的衝擊如何導致其從傳統向現代的轉化作出細緻、長程的專門考察。為了開展這樣的研究，必須細化觀念史研究及處理史料的技術，這樣，研究表達觀念的術語的重要性被發現了。

為此，德國歷史學家科塞雷克（Reinhart Koselleck，1923-2006）提出概念史（*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科塞雷克發現，為了研究現代觀念如何形成，必須找到明確的指標來揭示普遍觀念變化的軌跡。如何做到這一點呢？任何觀念的表達都需要通過語言，觀念的傳播及社會化更離不開語言。科塞雷克把用特定語彙表達的觀念稱為「概念」，¹⁹ 認為可以通過對某一時代通行語彙的意義分析來尋找當時人們所相信的概念，從而梳理現代概念如何在社會行動的衝擊下形成。

何為「概念」？科塞雷克將其定義為與語境相聯繫的觀念。任何概念都需要借助於辭彙來表達，某一概念的確切意義取決於該詞在使用中的語境。科塞雷克指出，雖然概念是用特定辭彙表達的觀念，但概念與辭彙不同。辭彙意思明確，而辭彙表達的「概念」意義則不甚確定。他甚至認為，指涉觀念的辭彙一定是其意思不明確，才算得上是概念。²⁰

為什麼概念具有如此奇怪的性質？我們知道，一個辭彙可以有不同的意義，如辭典可以明確羅列出一個詞的不同意義，這些意義在使

¹⁹ 中國的語言學家最早認識到觀念與語言之間的聯繫，例如黎錦熙在1924年《新著國語文法》給「詞」下了一個定義：「語詞簡稱『詞』，就是言語中間一個一個觀念的表示。觀念一名意象，英文為 IDEA。」黎錦熙編：《新著國語文法》（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32年），頁8。

²⁰ Reinhart Koselleck, “A Response to Comments on the *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 in *The Meaning of Historical Terms and Concepts: New Studies on Begriffsgeschichte*, eds. Hartmut Lehmann and Melvin Richter (Washington, D.C.: German Historical Institute, 1996), 59-70.

用中是被普遍接受、可以用於交流的；人們可以在不同語境中使用並理解它的確定意義。語言又是隨著社會生活的演變而處於變化中，一旦舊詞被社會生活賦予新意義，就必須重編辭典，加入新意義。如果該辭彙新意義越來越多、甚至新意取代原有主要意義，該詞的意義只有回到歷史上的語境才能理解。如今中文裡「民主」一詞，乃是「民主之」（人民作主）這一現代意義取代了原有「民之主」（君王）之結果，確定「民主」一詞在近代史上準確的意義，就只能通過閱讀不同時代文本的上下文才能判斷。這即是辭彙在不同歷史語境中對應著的不同觀念的例子。觀念的不斷流變，正是歷史上的觀念在社會行動衝擊下一次又一次演變而成，它如同波浪沖刷岩石留下一道道波紋。科塞雷克對概念的獨特定義，正是為了發現觀念變遷在術語中留下的軌跡。

科塞雷克的主要貢獻是他主編並參與撰寫德國《概念史文庫》（1955）、《哲學歷史詞典》（1971-2007）以及《歷史中的基本概念——德國政治和社會語言歷史辭典》（1972-1997）。《歷史中的基本概念》中收錄了 115 個在歐洲講德語的地域從 1750 至 1850 年間的基本社會及政治概念（social and political concepts），通過辭彙歷史語義的考察，從這一百多個概念（辭彙）的起源、定型和變遷中揭示德國現代思想的形成。這套規模空前的八卷辭典系列，被評為「至今為止嘗試過的最深刻細緻的政治社會概念史研究」。

實際上，德國概念史研究者追溯德國現代觀念的形成，就是德意志民族形成的近現代史，在概念的流變中發現蘊藏整個社會現代轉型的歷史。可以看到，柯林武德第三原理得以很好的證明。這樣一來，對柯林武德的「歷史知識濃縮於思想結構」的第三原理，在科塞雷克的概念史中被研究者重新表述為「歷史沉澱於特定概念」。²¹

與科塞雷克同時代的英國文化史學者雷蒙·威廉士（Raymond

²¹ 方維規：〈歷史沉澱於特定概念〉，《二十一世紀》總第 111 期（2009 年 2 月），頁 124-131。

Williams, 1921-1988)，在研究英國 1780 年至 1950 年社會文化變遷時，也發現了和「歷史沉澱於特定概念」類似的現象。他為了尋找英國社會文化長程變遷的證據，選擇了「工業」、「民主」、「階級」、「文化」……等關鍵詞進行研究。他發現這幾個詞在不同時代、不同地域的內涵意義皆不盡相同。他意識到這些辭彙意義的演變可以作為社會文化變遷的重要指標。在 1958 年出版《文化與社會 1780-1950》一書中，威廉士揀選了 60 個辭彙的分析作為附錄。他後來又發現這些研究辭彙意義變遷的附錄比原書更重要，於是在 1980 年代把附錄獨立集為一本新書，這就是《關鍵詞：文化與社會的詞彙》。該書討論了 130 多個辭彙在西方的起源和變遷，其表達雖比較簡單，但內容卻和概念史異曲同工。

威廉士發現，他在做一件奇怪的事情。表面上看，關鍵詞研究是在編辭典，即去確定一個個關鍵詞的起源以及探討其在各個時代的意義；但是既然已經有了《牛津大辭典》，這種工作還有意義嗎？他隱隱感到自己所做的事與語言學編辭典不同，但又沒講出兩者的根本差別。實際上，並非辭典中所有詞都是關鍵詞研究的對象。無論是科塞雷克研究德國概念史，還是威廉士研究英國文化變遷，都是通過詞意的變化來揭示兩國社會轉型與觀念的長程演化過程，方法上都是以關鍵詞為中心的歷史語義學，它是一門不同於歷史語言學的橫跨歷史和語言學的新學科。

五、大歷史的結構：觀念與事件的互動網絡

我們認為，觀念（概念）史研究並不能停留在歷史事件如何制約關鍵詞意義變遷的微觀分析上，還應該將一個個關鍵詞意義分析拼合起來得到歷史的宏觀圖像，並總結出社會行動是如何反作用於支配其發生觀念的一般法則。如前所說，這是歷史研究中不同於社會科學的獨特因果律。一談到歷史研究的因果律，人們立即會想到 1942 年

亨佩爾（Carl G. Hempel，1905-1997）在《歷史中普遍定理的功能》中提出著名的覆蓋定律。他指出：在歷史研究中，解釋事件 E 為什麼發生時，通常是去追溯促使事件 E 發生的另一事件 C（或條件組 C1、C2、C3……），然後闡明 C 和 E 之間聯繫 L 的普遍有效性，²² 這樣才算解釋了歷史事件 E。這裡，C 相當於原因，L 即為因果律，而 E 則可被視為 C 和 L 帶來的結果。亨佩爾認為，這種對 E 之所以發生的解釋方法與自然科學中的因果分析完全一致。²³

我們認為，亨佩爾提出的因果律並沒有意識到歷史事件的核心是社會行動，照搬表達自然事實之間關係的因果律來描述歷史過程往往是無效的。其實，條件組 C 中，只有部分元素屬於自然事實，而人類歷史的核心是觀念和社會行動之間的互動。只有條件組 C 所有因素均為自然事實時，亨佩爾覆蓋定律才成立。例如，歷史上龐貝城的毀滅，火山爆發 C 導致龐貝城的毀滅 E，火山爆發與人的行為無關。在社會科學中，當 C 是社會行動時，L 可以是某種法則（如經濟學或博弈論的原理），用 C 和 L 解釋另一個社會行動 E，其解釋歷史的前提是觀念不變（可懸置），這只是社會科學因果律在歷史學的運用，亦非歷史的因果律。只有當 C 是觀念或觀念系統，C 導致 E，這才是歷史學所獨有的。歷史研究是人的活動，人有自由意志，人達到目的行動，並不符合如自然規律般的必然性，因此，亨佩爾提出的覆蓋定律不是歷史研究的因果律。

我們認為，要表達歷史展開獨特的因果律，就必須把事件 E 如何改變觀念（或觀念系統）放到觀念與事件的過程中去展開，也就是探討社會行動如何反作用於支配它的觀念。我們將其表述如下：C1

²² 1950 年代後，亨佩爾又把概率解釋補充到他的歷史解釋模式中，企圖在歷史研究中提出一套符合科學規範的新研究方法。這裡，C 和 E 可以是概率相關的。

²³ Carl G. Hempel, "The Function of General Laws in History," in *Readings in the Philosophy of Social Science*, eds. Michael Martin and Lee C. McIntyre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4), 43-53.

為支配社會行動 E 的觀念，E 的發生或造成的後果對 C1 產生巨大的反作用，使 C1 轉化為 C2 或形成 C2。該過程在人的腦海中重演證明其為真，我們稱其為歷史展開的獨特因果分析，或稱因果律。

這樣，我們可以把亨佩爾以分析哲學的形式表達改寫如下：

- (1) C1、C3、C4 ……Cn n ≥ 1
- (2) L1、L3、L4……Lm m ≥ 1
- (3) E
- (4) L2
- (5) E、L2 使 C1 轉化為 C2

其中，C1、C2 是支配事件發生的觀念（或觀念系統）類，C3 是社會行動類，C4 是自然事實類等……。它們和事件 E 的關係是 L1、L2、L3、L4。L1 是觀念（或觀念系統）支配行動，它不是因果律而是人達到目的的過程；²⁴ L3 是社會科學法則在歷史研究中的運用；L4 是自然科學在歷史研究中的運用（如前面所談到的龐貝城毀滅）。此外還有一種情況，即 E 對 C1 的反作用，用 L2 表示，反作用下改變了的觀念是 C2，這一過程才是歷史研究中獨特的，其展開過程中體現了歷史獨特的因果律。也就是說，L3 和 L4 構成歷史展開的社會科學和自然背景，L1 和 L2 才是歷史研究的核心，它是觀念（或觀念系統）如何支配行動、行動結果又如何改變觀念（或觀念系統）並引發新行動的互動鏈。

有了準確表達，我們就可以把握歷史展開的過程了。首先，任何歷史過程都有大量 C3、C4 存在，它們和 L3、L4 一起構成了歷史展開不可缺少的自然條件和社會舞臺，也即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因果律是解釋歷史必不可少的前提。例如氣候長程研究證明，一萬五千年前，冰河開始退去，人類文明和歷史正是發生於這段溫暖時期。「漫

²⁴ 嚴格地說，L1 應表達為：在 C3、C4 條件下，行動者根據觀念 C1，實現該觀念之過程 L1 導致事件 E 發生。C3、C4 是外部條件，通常是不可控的變量。

長的夏天」提供了人類歷史展開的自然舞臺。又例如公元前6000年，勞倫泰德冰床（Laurentide Ice Sheet）崩解，大西洋循環減緩，一系列氣候變遷連鎖效應導致海平面上升，古黑海滿溢氾濫，形成今日的黑海。這一過程蘊藏在人類關於大洪水的各種古老歷史記憶中。²⁵但只有L3、L4則不構成歷史，歷史學的核心由L1和L2組成的。

抓住歷史解釋的核心L1、L2，即可發現上面表達歷史展開過程的五個步驟只是社會行動的基本單元，而不是社會行動的全部。因為C2作為新的觀念（或新的觀念系統）就產生其支配的新的社會行動，即C3、C4、L3、L4加上C2可以導致新的事件，新事件亦可能再次對觀念反作用以形成新的普遍觀念（或新的觀念系統），新的普遍觀念（或觀念系統）支配的新行動又可以造就不同於原有觀念的新觀念（或觀念系統），如此等等。換言之，L1、L2耦合成觀念和事件的互動，構成歷史進程的核心鏈條。

顯而易見，L1、L2的耦合類似於一個互為因果的過程，其展開有兩種不同狀況。第一種情況是，事件E對觀念（或觀念系統）C1的反作用只是再一次肯定或強化原有觀念（或觀念系統）C1，這時，行動後果不會改變觀念（或觀念系統），觀念（價值）或觀念系統呈現出不變性。所有社會行動均為某種大致不變的觀念或觀念系統支配的行動。我們會把第一種狀況和社會結構的穩態相對應，可以稱為維持或保持某種社會結構的行動或與社會結構不矛盾的行動。²⁶第二種情況是社會行動發生的後果相當大地改變支配其進行的觀念（或觀念系統），新觀念（或觀念系統）導致的新社會行動再一次產生新觀念（或新的觀念系統），在此過程中觀念或觀念系統在L1、L2耦合中不斷變化。第二種情況對應著社會結構的轉變；當主流基本觀念（或觀

²⁵ 布來恩·費根（Brian Fagan）著，黃煜文譯：《漫長的夏天——氣候如何改變人類文明》（臺北：麥田出版社，2006年），頁130。

²⁶ 金觀濤、劉青峰：〈論歷史研究中的整體方法〉，《知識份子》（紐約）1987年春季號，頁87-102。

念系統)和價值系統發生巨變時，意味著整個社會處於大變革的轉型時期。

我們仍以甲午戰爭為例說明這兩種情況。如前所述，日本參與甲午戰爭是出於其獨特的民族主義，日本在甲午戰爭中的獲勝進一步肯定了其擴張的民族主義，即社會行動的後果強化了原有觀念。在強化了的民族主義支配下日本投入1904年日俄戰爭。日本戰勝沙俄，進一步強化該觀念，它進一步支配日本在1930年代侵華及其後發動太平洋戰爭，直至1945年投降。我們看到，自明治維新日本成為現代民族國家以後，L1、L2耦合只是不斷強化其獨特的民族主義，直到其戰敗。

甲午戰爭E對支配中國參戰觀念的反作用與日本完全不同。正是甲午戰敗使中國士大夫從儒學經世致用救國保種的幻夢中驚醒，中國開始了觀念巨變的轉型時代。也就是說，甲午戰敗E帶來的後果對支配其發生的觀念C1反作用，動搖了以儒家社會為最優的信念，使其變成C2。C2即為維新思潮，它支配了新的社會行動，這就是戊戌變法。戊戌變法的失敗進一步反作用於C2，新的觀念系統導致庚子事變。庚子事變進一步反作用於支配其發生的觀念系統，令清廷下令推行全面改革的新政。在L1、L2耦合中觀念系統發生激烈變化，標誌著社會秩序的動盪和整個社會的現代轉型。

對比日本和中國兩種L1、L2耦合，可發現各自有其觀念不變的時期，亦各自有其觀念巨變的時期。如中國在甲午戰爭前三十年中，L1、L2耦合中觀念基本不變，即處於儒學經世致用指導社會行動的階段。而日本在明治維新前後十年則是L1、L2耦合中基本觀念巨變的時期。由上述分析得到一個重要結論，可以根據L1、L2耦合中基本觀念的變和不變區分出不同階段；另外，觀念變化的階段與社會行動性質變化的階段是同步的，這些階段的劃分標誌著社會的宏觀演化。也就是說，耦合中基本觀念不變的時期對應著一種穩定的社會結構，觀念的巨變是社會結構轉型，新觀念穩定下來意味著新社會結構

的形成。L1、L2 耦合中蘊含著大歷史的結構。

六、數位人文學的來臨

尋找大歷史的結構，一直是歷史唯物論和年鑑學派的追求。但經濟決定論的失敗以及年鑑學派陷於瑣碎細節難以自拔的困境，使得二十世紀史學界厭惡宏大歷史敘事，這也是後現代史學興起的原因。觀念史和概念史異軍突起及研究結果則表明，概念史和關鍵詞研究可以揭示大歷史的結構。我們在上一節提出經修正的亨佩爾表達形式，論證在 L1、L2 類似互為因果的耦合過程中，觀念變化過程和社會行動性質變化過程具有同步性，只要找到觀念變化的階段，也就找到了社會行動轉化的階段，即證明了為什麼概念史和關鍵詞研究可以揭示大歷史的結構。

我們對現代漢語中若干重要政治術語的起源和形成的研究，也可以證明這一點。中國現代觀念在西方衝擊下的起源、形成和重構，發生在 1830 至 1930 這一百年間，大約比德國晚一個世紀。自 1997 年起，十多年來我們建立了從晚清到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大約一億兩千萬字中文文獻的「中國近現代思想史專業數據庫（1830-1930）」，²⁷ 並對諸如「科學」、「民主」、「權利」、「社會」、「革命」、「個人」等最重要的十組現代觀念及與此相關的近一百個政治術語作出了歷史語義分析。²⁸ 通過這項研究，我們發現中國現代重要政治觀念的形成大都經歷了以下三個階段：

²⁷ 「中國近現代思想史專業數據庫（1830-1930）」文獻目錄及說明，參見金觀濤、劉青峰：《觀念史研究：中國現代重要政治術語的形成》一書附錄一〈「中國近現代思想史專業數據庫（1830-1930）」文獻目錄〉，頁 463-477；而《觀念史研究：中國現代重要政治術語的形成》則收集了過去十年發表的相關主要論文。

²⁸ 參見金觀濤、劉青峰：《觀念史研究：中國現代重要政治術語的形成》一書附錄二〈百個現代政治術語詞意彙編〉，頁 479-571。

第一個階段是1840 年至1894 年，即從鴉片戰爭到甲午戰爭。這一時期，儘管西方現代衝擊已不可抗拒的來臨，中國經歷了兩次鴉片戰爭、太平天國大動亂、洋務運動和中法戰爭，也被迫納入了國際條約體系，但支配中國人參與及處理中、外重大事務的社會行動的觀念仍是儒學的經世致用（如由天下觀轉化而來的萬國觀等）。這一時期，中國人對西方現代觀念的態度是選擇性吸收，即藉由傳統政治文化來理解外來新觀念的意義，對那些中國傳統觀念沒有的、全新的現代觀念則視而不見。統計分析表明，絕大多數西方現代觀念都是1895 年以後進入中國的。這也說明了甲午戰敗對原有觀念系統的反作用是何等巨大，中國從此進入思想和社會的巨變時期。

第二階段是從甲午後（1895-1900）到新文化運動前（1915）大約二十年，這是中國人以最開放的心態接受西方現代觀念的時期。統計分析表明，這一時期隨著儒家倫理退到私領域，中國人在公領域全面學習、引進西方現代觀念及制度；與此同步的是清廷發起自上而下全面改革，中國迅速由帝國向現代民族國家轉型。西方新觀念大多在這一階段傳入，以前經選擇性吸收的現代觀念亦變得較接近西方原意，故可稱這一時期為學習階段。

第三階段則是新文化運動時期（1915-1925）。在大約短短十年中，重要現代觀念被消化及重構，產生了中國式的現代觀念。統計研究發現，如果僅僅考察一個個觀念本身，今日中國人所持基本觀念的意義和五四新文化運動後期大致相同。新文化運動後期，由這些基本觀念組合為兩種不同觀念系統，即1920 年之後形成了由中國式現代觀念構成的三民主義和馬列主義，此後是這兩種革命意識形態與社會行動激烈互動的時代。²⁹ 因此，我們把新文化時期形成的中國政治觀念稱為中國人的當代觀念。

由觀念史研究發現這三個時期的基本觀念是不同質的，與它們相

²⁹ 金觀濤、劉青峰：《觀念史研究：中國現代重要政治術語的形成》，頁6-21。

對應的社會行動也必定是不同質的。這樣，中國近現代社會變遷也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把向西方學習納入儒學經世致用的軌道，該時期中國傳統社會的基本結構並沒有受到觸動。正是甲午中日戰敗證明支配洋務運動觀念系統的虛妄，中國傳統社會才開始現代轉型，這就是第二階段，其主線是學習西方現代政治經濟制度並建立現代民族國家。第二階段的學習導致嚴重社會整合危機，由此引發了中國文化對西方引進的現代觀念進行重構，這就是新文化運動對應的第三階段。新文化運動既是一次啟蒙運動，亦是歷史上中國文化融合外來文化經驗的復活。因此，可以說新文化運動是新道德意識形態形成時期；新道德意識形態迅速取代儒家意識形態，中國進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和三民主義建立黨國並互相競爭的時代。五四以後至二十世紀後期，當這兩種道德意識形態先後式微，中國社會才回到社會現代轉型的基本軌道上來。³⁰

根據以上分析，我們把1840至1895年稱為「中國的近代」，即西方現代衝擊來臨且不可抗拒、但中國仍處於傳統社會的時期；1895至1915年稱為「現代」，這是中華帝國向現代民族國家轉化的時期；新文化運動至今稱為「當代」，這是革命意識形態支配社會行動以及革命烏托邦幻滅的時期。這種由觀念史研究所揭示的三階段對中國傳統社會轉型的分期，與今日通行史觀的分期不同。我們認為，這種分期方法比革命史觀能更為準確地把握中國社會現代轉型的整體過程。

本來，我們研究的目標只是中國現代觀念起源和演變，它被嚴格限定在概念史領域，但令我們驚奇不已的是，研究政治術語的演變竟可以得到中國近現代社會轉型分期的宏大歷史視野。我們之所以能夠作出歷史分期的判斷，與我們運用數據庫方法來作出對關鍵詞的歷史語義分析相關。那麼，為什麼數位方法可以有助於人文研究者獲得更

³⁰ 金觀濤：〈辛亥革命和中國近現代史的分期〉，於首爾“*The 31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hinese Studies in 2011*”（2011年8月17日至19日）之演講，未刊稿。

為宏觀的歷史視野呢？

在概念史研究中，是要尋找表達 C1 和 C2 的關鍵詞，通過其語義分析發現 C1 向 C2 轉化的邏輯。研究者必須在自己腦海中重演以下兩個過程，即 C1、L1 支配作用下產生 E，以及 E 和 L2 作用下產生 C2。其中，E 不是觀念而是社會行動，是前後觀念轉化的關鍵性環節。一般來說，觀念轉化過程中涉及到哪些社會行動，並不是想當然就可以知道的。如果按柯林武德所說把史料看作證詞，那麼 E 和 C 一樣，就必須從文本閱讀中來尋找並加以確定。這樣，整個研究不僅涉及與觀念 C1、C2 相關的關鍵詞分析及統計，還須涉及描述事件 E 相關的關鍵詞分析。而用特定術語表達的社會行動 E，是由具有確定觀念的人紀錄下來的，我們稱之為「觀念史圖像中的事件」。³¹因此，分析觀念史圖像中的事件怎樣被紀錄以及它和觀念之間的互動，必然會超出僅僅分析與觀念 C1、C2 有關的概念史範圍。

由此可見，關鍵詞的歷史語義分析範圍應該比觀念史的範圍大得多。這是因為，關鍵詞除了可以是表達概念的辭彙，更大量的是指涉事件、主體、價值、空間及各類事物的辭彙，共同構成文本的語境。因此，原則上說，選擇不同類型、不同指涉對象的關鍵詞，對它們作出各自歷史語義研究，就可以涵蓋歷史、語言、傳播、事物等不同的人文領域。只有當關鍵詞代表概念時，即只有當被研究的關鍵詞代表的是觀念 C1、C2（或科塞雷克所說的「概念」），其意義分析才構成概念史的基本內容。³²如被研究的關鍵詞是歷史事件以及與該事件共生語境的辭彙，就可以分析研究「觀念史圖像中的事件」如何流變、形成某種共有的歷史記憶，這是歷史研究中最為迷人的一面。³³

³¹ 金觀濤、劉青峰：《觀念史研究：中國現代重要政治術語的形成》，頁 396-409。

³² 我們曾給觀念一個工具性定義，它是用一個或一組關鍵詞表達的思想。一旦這樣定義，立即發現把概念和觀念區別開來是沒有必要的。觀念史就是概念史。

³³ 金觀濤、劉青峰：《觀念史研究：中國現代重要政治術語的形成》，頁 434。

由此，我們更擴大一點說，關鍵詞研究的對象可以不僅僅是表達概念或事件的辭彙，還可以把不同類別的辭彙作為關鍵詞來研究，其目的是揭示歷史在不同面向的演化過程。如關鍵詞是代表某一行為主體，如「中國」、「中華」，就可以研究其屬性如何形成以及凝聚成某種特定的認同，揭示該主體如何被界定及其歷史意義結構的形成和變遷。如被研究的關鍵詞是指涉具體的事物，如「水泥」，關鍵詞研究可以確定其在歷史上使用過的各種辭彙及定名的詞化過程，分析不同地區使用辭彙的文化影響。³⁴ 柯林武德所謂歷史是活著的過去，上述研究正是通過語言挖掘這活著的過去，展現它們如何隨著一代代人而處於流變的過程。由此，我們認為，柯林武德提出的「歷史濃縮在思想結構中」和概念史家認為「歷史沉澱特定概念」，可以更準確地表述為「歷史知識包含在某些關鍵詞意義形成之中」。也就是說，對每一個文明或民族，其語言中的辭彙意義，是該詞在不同時代使用中意義的多次沉澱結果；分析其意義變遷過程，就可揭示整個社會生活及觀念的變遷的歷史。

人文和歷史知識是蘊含在文本意義世界之中的，對文本中各種關鍵詞的挖掘以及意義統計分析，就成為探索這過去意義世界最重要的手段。而電腦數據庫的建立和應用，統計分析及數位技術的開發，也將成為人文研究者十分有用的輔助工具。隨著越來越多不同類型的人文數據庫建立和使用，我們可以期待包含觀念史、概念史、觀念史圖像中事件史、主體認同史和事物史的數位人文學誕生。

正是在中國現代觀念起源和演變的研究中，我們逐漸意識到數位人文學的基本方法和內容及其有效性。³⁵ 近兩三年以來，在我們與政

³⁴ 例如，鄒振環研究發現了對應“cement”約40個中文辭彙，其中不乏地方特色，如「紅毛土」（臺灣方言）、「番家灰」（閩方言）。參見鄒振環：〈“Cement”的漢譯與晚清水泥技術知識在上海的譯介〉，收於上海市檔案館編：《上海檔案史料研究》（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10年），第8期，頁3-14。

³⁵ 劉青峰：〈觀念史研究與數據庫的建立和應用〉，收於臺灣大學數位典藏研

治大學「中國現代認同的形成和演變」研究群定期研究活動中，年輕的博、碩研究生利用數位方法已取得了初步但又相當可喜的成果。例如，我們過去沒有把動詞作為關鍵詞來研究，而研究群中有同學以動詞「改造」為關鍵詞，它涉及行動主體及改造對象，他的研究發現，「改造」的對象有一個從器物（如炮、艦）到制度、再到思想、道德的變化過程。³⁶ 以前我們也沒有能力處理使用數量達數萬次的關鍵詞，有同學在數位工程師協助下，在五萬餘條「主義」例句中，確定了近1680種主義的用法。³⁷ 還有的同學從語境對確定關鍵詞意義的重要性出發，嘗試使用尋找與關鍵詞共生的「關鍵詞叢」數位方法。³⁸ 我們體會到，人文研究者與數位工程師合作意味著一門新學科——數位人文學正在來臨。數位人文學的出現意味著歷史研究的科學化，亦是科學和人文融合的開始。

我們想強調的是，方興未艾的東亞觀念史研究很可能是展開數位人文研究的最有成效的領域。一方面這是因為中、日、韓在歷史上同屬漢字文化圈，而西方現代觀念傳入東亞，新觀念、新名詞在三國間主要是用漢字形式傳播、相互影響；目前各國歷史、語言學者對於這個十分複雜的互動過程，已作出相當多的研究，現正在尋求互相整合，以獲得更為宏觀的東亞現代觀念形成的大歷史視野。另一方面，由於現代觀念在中、日、韓三國間的傳播和互動的形成期主要是使用漢字，語種單純使得中、日、韓三國各自建立的觀念史研究全文檢索的各種數據庫易於整合並共享，從而使得數位方法可以大展身手。因

究發展中心與臺灣大學圖書館合辦：「數位典藏與數位人文國際研討會」（2010年11月29-30日），《數位典藏與數位人文國際研討會論文集》，頁27-49。

³⁶ 姚育松：〈從「改造」一詞的使用看共產主義在中國的發生背景〉，收於《數位典藏與數位人文國際研討會論文集》，頁161-190。

³⁷ 詹鑒亦、王乃昕：〈「主義」的數位人文研究〉，收於《數位典藏與數位人文國際研討會論文集》，頁229-268。

³⁸ 邱偉雲：〈關鍵詞叢與文本意義挖掘的嚐試：以《清季外交史料》為例〉，收於《數位典藏與數位人文國際研討會論文集》，頁191-227。

此，我們可以期待，大歷史研究很有可能將在這一領域出現。在觀念決定論消亡、歷史哲學衰落一個多世紀後，人們對大歷史的追求並沒有隨之湮滅，也許，剛剛出現尚在起步的數位人文研究能為這種追求帶來一線希望之光。

(責任編輯：周謝宏)

徵引書目

- 丸山真男著，王中江譯：《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北京：三聯書店，2000年。
- 方維規：〈歷史沉澱於特定概念〉，《二十一世紀》總第111期，2009年2月，頁124-131。
- 布來恩·費根（Brian Fagan）著，黃煜文譯：《漫長的夏天——氣候如何改變人類文明》，臺北：麥田出版社，2006年。
- 林明德：《袁世凱與朝鮮》，收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專刊（26）》，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年再版。
- 林熒澤：〈中國中心天下觀及其克服的課題〉，韓國成均館大學校主辦：「東亞學術院國際學術會議」（2006年5月18日）論文，未刊稿。
- 邱偉雲：〈關鍵詞叢與文本意義挖掘的嚐試：以《清季外交史料》為例〉，臺灣大學數位典藏研究發展中心與臺灣大學圖書館合辦：「數位典藏與數位人文國際研討會」（2010年11月29-30日），《數位典藏與數位人文國際研討會論文集》，頁191-227。
- 金觀濤、劉青峰：〈從「天下」、「萬國」到「世界」——晚清民族主義形成的中間環節〉，《二十一世紀》總第94期，2006年4月，頁40-53。
- 金觀濤、劉青峰：〈論歷史研究中的整體方法〉，《知識份子》（紐約）1987年春季號，頁87-102。
- 金觀濤、劉青峰：《觀念史研究：中國現代重要政治術語的形成》，香港：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2008年。
- 金觀濤：〈辛亥革命和中國近現代史的分期〉，於首爾“The 31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hinese Studies in 2011”（2011年8月17日至19日）之演講，未刊稿。
- 姚育松：〈從「改造」一詞的使用看共產主義在中國的發生背景〉，收

- 於《數位典藏與數位人文國際研討會論文集》，頁161-190。
- 柯林武德（R. G. Collingwood）著，何兆武、張文杰譯：《歷史的觀念》，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年。
- 約翰·伯瑞（John Bagnell Bury）著，范祥濤譯：《進步的觀念》，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5年。
- 戚其章：〈中日甲午戰爭史研究的世紀回顧〉，《歷史研究》2000年第1期，頁148-165。
- 詹奎亦、王乃昕：〈「主義」的數位人文研究〉，收於《數位典藏與數位人文國際研討會論文集》，頁229-267。
- 鄒振環：〈“Cement” 的漢譯與晚清水泥技術知識在上海的譯介〉，收於上海市檔案館編：《上海檔案史料研究》第8期，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10年6月。
- 雷蒙·威廉士（Raymond Williams）著，劉建基譯：《關鍵詞：文化與社會的詞彙》，臺北：巨流圖書公司，2003年。
- 劉青峰、金觀濤：〈19世紀中日韓的天下觀及甲午戰爭的爆發〉，《思想》第3期，2006年10月，頁107-128。
- 劉青峰：〈觀念史研究與數據庫的建立和應用〉，收於《數位典藏與數位人文國際研討會論文集》，頁27-49。
- 黎錦熙編：《新著國語文法》，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32年。
- 諾夫喬伊（Arthur O. Lovejoy）著，張傳有、高秉江譯：《存在巨鏈——對一個觀念的歷史的研究》，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
- Hempel, Carl G. “The Function of General Laws in History.” in *Readings in the Philosophy of Social Science*. Edited by Michael Martin and Lee C. McIntyre.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4.
- Koselleck, Reinhart. “A Response to Comments on the *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 in *The Meaning of Historical Terms and Concepts: New Studies on Begriffsgeschichte*. Edited by Hartmut Lehmann and Melvin Richter. Washington, D.C.: German Historical Institute, 1996.
- Lovejoy, Arthur O. “The Historiography of Ideas.” in *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Ideas*. Baltimore: John Hopkins Press, 1948.